

伦敦骚乱，一场夭折的“革命”？

文/简军波

在伦敦发生的骚乱不过是底层少数人群对强大国家机器自发开展的一场宣泄不满情绪的狂欢，是一场没有来得及演变成政治革命的社会冲突。

发生在伦敦的暴力冲突事件业已平息，但对于事件更为深层次的反思才刚刚开始。虽然有不少国内外媒体从一开始就探讨过事件的前因后果，但显然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

骚乱，还是社会革命？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街头骚乱。但有些媒体把该事件和其他地区的骚乱——比如近几个月来发生在阿拉伯地区的骚乱——相提并论。这些类比不无道理，因为它们有较多相似之处：都是由一个特殊的警民冲突的案例所引起；并由此引发社会底层民众的游行示威；随后迅速演变成暴力活动。

但它们有很多不同。“骚乱”只是一个描述性词汇，而“革命”带有对事件性质的终极判断，在意识形态上属于激进主义。然而，在判断伦敦所发生的这一次暴力事件的性质时，我们应当从多个因素去思考：参与主体、反对对象、诉求的原因、所要达成的目的，以及事件的组织化程度。

伦敦暴力事件的参与主体最初来自该城北部的托特纳姆Tottenham区的一批年轻移民后代，然而当事件迅速演变成街头暴力并蔓延到其他区域时，参与主体已经包括了本土人士

和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因此，事件开始于由托特纳姆区部分移民所组成的小规模游行示威，旨在反对警察杀害他们所认为的无辜青年马克·达根（Mark Duggan）以及长期的渎职与滥权，但最后演变成一场没有特定反抗对象的街头打砸抢暴力活动。事件最初是为了诉求司法公正，反对警察过度行使暴力，最后却变成一场反社会的暴力活动（尽管对有些个体参与者而言不过是一场无所事事之外的游戏），而每个参与暴力活动的人都带有各自目的，而伦敦事件与阿拉伯骚乱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完全没有组织性和明确的政治要求，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等虚拟媒介传递信息和号召开展行动，不是组织化行为。

卡梅伦政府将此事件称为暴徒们的犯罪——这是完全不合法的；而有些媒体将之冠以“革命”的称号——它肯定是合法的。而实际上，卡梅伦政府的斥责太过虚伪，而那些媒体的噱头又言过其实。

这不过是一场广为常见的社会冲突。它包含了非常复杂的阶层结构、利益与心理诉求、社会运作机制的困难与潜在的文化冲突。社会冲突的基本表现在于它是一场广泛的而不是特定群体在小范围内的无关大局的矛盾展现，而是整个社会张力的集中爆

发；它发生于或牵涉到几乎所有社会阶层与群体，而不只是单一群体的内部之间；它的原因极为复杂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贫富差距问题以及由此所演化而成的各类社会矛盾；而且，最为严重的社会冲突通常会导致一场政治变革，如果冲突不能在社会内部，在国家与人民之间达成和解与重订契约，换言之，如果民众不能通过司法（法律的途径）和政治诉求（通过选举等民主的途径）去缓解这些张力，早期的社会冲突会演变为反政府的政治革命，发生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事件正是社会冲突无法在机制内解决而失控之后的政治革命。

在英格兰，社会冲突还没有来得及演变成最终的政治革命而遭消灭，但是，基于这场骚乱参与群体的多样性、广泛性和复杂性，它最终的反社会与反对权力（与警察对抗）的表现形式，以及它自始至终所隐含的贫富差距和福利政策失效的阴影，可以看出，在伦敦发生的骚乱不过是底层少数人群对强大国家机器自发开展的一场宣泄不满情绪的狂欢，是一场没有来得及演变成政治革命的社会冲突。

而所有的社会冲突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是相似的：相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相同的冲突表现形式、相同的

如果有意忽视骚乱主体和移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如同掩耳盗铃，无益于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而过分强调这其中的联系又会加剧本来存在的文化断层甚至文化冲突，尤其当这些骚乱主体大多带有自身的信仰的时候。因此这将成为一个艰涩也很微妙的问题。

极为重大的消极影响，这才是引发骚乱的深层社会原因。

不过经济问题只是潜在的社会冲突引发成骚乱的最基本原因，它并不能解释骚乱发生时许多匪夷所思的现象：为何会有本土白人参加？为何示威会变成许多人的打砸抢等暴力行径？为何主要发生在英格兰地区？

每一个复杂现象的背后都会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它关系到心理、教养和受教育程度、道德感、不同族裔文化的差异，以及英国的警察制度，等等。但这些在作为社会冲突的整个事件面前都只是细枝末节，尽管有许多文章讨论这些细节背后的社会问题，但对于一场社会冲突而言，如果不是人们的财富和社会资源分配发生问题，所有那些过程当中的细节都无关大局。

意味着什么？

在全球化时代，一场社会冲突会带有深远的影响。一场最终演变成社会骚乱——即使没有变成政治革命——的社会冲突对英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将深刻地影响到其政治文化、社会管理机制、经济发展机制、移民制度甚至对外关系。

而最重要的莫过于对福利制度改革的影响。几十年来，西欧和北欧国家逐渐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制度

曾经被誉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尤其是北欧国家，甚至被许多人视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而备受推崇。但事到如今，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其他西方福利国家，长期实施的国家福利制度在全球化时代已走到穷途末路，改革将是必经之路。

在相对封闭的市场内，福利制度可以建立起稳定和的内部社会关系，但在一个资本、人口和商品四处流动的世界里，福利制度下的劳动力和经济制度已不能适应情况的发展。在与低成本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竞争的全球市场内，西方福利国家的人们因拒绝做出牺牲而难以与其他地区的劳动力竞争，这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繁荣和经济竞争力。但是，当法国萨科齐政府试图提高每周工作时间时，竟然受到了持续的示威抗议。

某种程度上，僵化的福利制度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国家发展的障碍，改革已是情势所迫，但改革的难度将会使英国等西方国家受到极大的挑战。

另外，骚乱将使英国作为一个长期倡导多元主义文化的国家去在面对多元种族和大量移民所带来的问题。在这次英格兰骚乱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些引发和参与骚乱的主体阶层来源于底层社会的贩夫走卒甚至无业游民，而同时他们又大多来自移民家庭。骚乱主体阶层与外来移民的大体重合无疑将引发英国社会对

移民的重新认识，并因此影响到其主流社会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国家属性和身份认同等诸多文化因素的重新思考，反过来也会使移民社会思考自身的地位和身份。彼此身份的重新确证将会加剧内部的族群紧张关系。

但如果有意忽视骚乱主体和移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如同掩耳盗铃，无益于社会问题的彻底解决；而过分强调这其中的联系又会加剧本来存在的文化断层甚至文化冲突，尤其当这些骚乱主体大多带有自身的信仰的时候（比如许多骚乱者是穆斯林，尽管英国主流社会不大公开讨论如此敏感的话题）。因此这将成为一个艰涩也很微妙的问题。

换言之，如果这场社会冲突只意味着纯粹的街头犯罪的话（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府在面对一场社会冲突时都习惯于将此斥之为“纯粹的犯罪”），那么可以肯定冲突将会在下一个街角不定时爆发；如果这一冲突被私底下视作为文化冲突的极端表现，那么引发的将不止是街头骚乱，而会是国际性冲突。

但在一个全球相互依赖、人员跨国流动如此丰富多元的时代，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伦敦的骚乱事件是整个世界上诸多矛盾的一个缩影和聚集点，每个国家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博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